

目录

专家解读：

- 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郭大成书记接受人民日报访谈
- 钱致榕：大学教育应回归培养完整的“人”
- 王义遒：掀起一个新高潮，迎接文化素质教育 20 周年！
- 钱颖一：人才培养要避免短期功利主义

——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会员来稿：论通识教育视域中的艺术课程改革

——以上海大学重点课程《音乐大师与经典名作》为例

学术活动：

- 第六次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聚焦“立德树人”
- 学会代表应邀赴美参加美国核心文本和课程协会（ACTC）
第二十届年会
- 学会秘书长庞海芍应邀参加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学会二十周年
庆祝大会暨 32 届通识教育教师研习会
- 学会秘书长庞海芍赴美参加 ACTC 举办的“核心文本在通识
教育中的传统与创新”学术论

活动资讯：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2014 年年会暨
第四届高层论坛将在哈尔滨举行
- 第 2 期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讲习营即将在兰州举办

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郭大成书记接受人民日报访谈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

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一度是教育领域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从大学角度来说，并不等于不要行政部门，而是减少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预，淡化“官本位”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以及政府简政放权的提法，再次让我们对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和具体管理，让大学自主办学，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为此，记者对话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听他讲述，大学教育改革应从淡化“官本位”思维开始。

记者：请您讲讲在大学淡化“官本位”思维的必要性。

郭大成：一方面，政府行政部门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干预很容易造成政府行政权力自我不断膨胀，部门利益不断扩大，大学苦于为各类指标奔波，甚至会因此而造假，各类泡沫会越来越大，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也会遭到侵蚀。

另一方面，大学泛行政化很容易抑制甚至扼杀学术生产力，加剧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不良风气，在这种风气下，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和创造力的学生，也与大学独立、自治的改革方向相悖，最终会让大学失去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

记者：您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该如何简政放权？大学又该如何淡化“官本位”思维？

郭大成：我很赞成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说法，他认为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也应该从内外两个层面来考虑，并且在制度设计上，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从政府角度来说，要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和具体管理，“要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简政放权，让大学自主办学，从行政干预向宏观管理和服

务转变，着重从把方向、管投入、抓班子、重服务入手。

记者：那从大学角度来说呢？

郭大成：从大学角度来说，就是减少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预，通过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结构，建立突出大学本质的现代大学制度，让大学回归其本质，同时，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强调学术本位，以人才培养为第一价值取向。

首先，大学应回归大学本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大学办学的根本问题。因此，大学内部要强化育人的各个要素，使得这些要素的活力相互迸发，使得大学的精神进一步彰显。

其次，突出学术本位。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者为中心，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发挥教授治学作用，推动学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弘扬学者应具有的批判理性及其精神。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时，要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营造出高校教师对学术的归属感和信任感。

还有，大学内部也需要简政放权。综观国内外一流大学，都是小机关、大学院，二级学院才是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实体。因此，大学要进行改革，就要通过简政放权，促进管理重心下移，让学院等基层单位充满活力。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系统。决定这一系统品质的主导因素如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文化传承等都属于慢变因素，正是这些慢变因素决定和主导着大学整体演化。因此，大学的改革需要慢节奏，需要注重艺术，也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最忌讳的便是翻来覆去，朝令夕改，走回头路。鉴于此，大学的改革要注重“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多一份理性的规划和设计，多一些慎重的试点和尝试，少一份盲目的跟从，坚守大学的自身品格，有所为有所不为。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04月10日 17版）

大学教育应回归培养完整的“人”

钱致榕：台湾政治大学博雅书院院长、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原创校学术副校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教授



“排名指挥棒”让很多高校迷失了办学方向，无论是科研还是人才引进，学校对学术GDP的看重，甚至超过了学生本身。让大学教育回归到培养真正完整的“人”——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学术副校长，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先生带领了一批同道学者，在台湾和大陆的大学推动博雅教育。他们中，有

人在海外有终身教职，也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名校、专为博士生授课的老教授……在台湾的大学里，钱致榕推出的博雅课只有 20 个学分，但他却希望它能与 120 个学分的专业课“抗衡”。

最初开设这些课程时，没哪个学院的院长愿意让出授课时间；但艰难地坚持几年后，连很多专业任课老师都发现，学生的学习状态变了：他们的眼睛一天天“亮”了起来，上完通识课后，他们懂得在专业课上提问题……

钱致榕日前在复旦大学的“创新教与学”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博雅教育，面对学生五十年的需要，回归大学育才的目的”的演讲，并在演讲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编者

教育部最该做的是取消排名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需要。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大学迎合市场，并非在培养真正的人才。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大陆恢复高考至今，国内综合性的大学越来越多。经过“211 计划”、“985 计划”，这些大学出现在国际学术领域里，论文发表得越来越多，可对人才培养却越来越不重视。大学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排名和论文发表数上，这两年又开始重视论文的影响因子了。但这 20 多年来，我在国内参加了很多会议，看到很多大学在教学方面做得实在欠缺。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恐怕是，要让教育部统一下指令，改变对所有高校的考核标准。应该把各种考核指标改成“在未来五年里发展出什么好课程和好教材”，而不是在科研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其实，每年每天都有人在发表论文，哪怕是国际顶尖的《科学》杂志，如果你回头看去年它发表了什么文章，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其中的每一篇论文呢。真正有意义的论文屈指可数。

但今天，大学培养了什么人才，我们 20 年、30 年乃至 50 年后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大学应该把目标放长远。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需要。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大学迎合市场，并非在培养真正的人才。

今天的大学是为未来 20-50 年储备人才

大学培养年轻人只为他们毕业找到个工作？年轻人未来如何有人关注吗？如果我们的大学可以让年轻人每 5 年回炉一次，或者学制延长到 20 年，那么学生 20 年后自然还符合市场要求。如果大学培养的人过了头 5 年就要被淘汰，甚至没出校门就已经过时了，那让我们这些教育界的人，情何以堪？

很多大学谈起人才培养头头是道，也有不少大学号称自己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但有多少大学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办大学？我们为谁办大学？我们到底在办怎样的大学？

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来很简单，办大学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是为搞研究，那么去办科学院就可以了，科学院的研究条件比较好，也不需要为大学生操那么多心。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投资，其实是为了让大学培养人。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为谁培养人才？我们如果是为美国培养人才，那么就必须学习哈佛大学；如果为英国培养人才，那么就应该学习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但是中国的大学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成天想办法去学哈佛和牛津，我们没有他们的条件，没有他们的需要，我们的学生和他们不一样，一定要从中国今天的需要出发。

大学还得问问自己，自己到底在为未来的哪一个时间段培养人才？

现在，国家的很多中坚力量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而今天的年轻人等到毕业走向社会，大概是从 2015 年到 2020 年。所以，我们是为 2020 到 2070 年的中国培养人才。

到 2070 年，社会需要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今天，我们高校里成立了很多研究院，出现很多大平台，它们都是为目前很红火的专业而设的，可这些专业在 20 年前是没有的。不妨想像一下，20 年后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最专业的专业，我们现在可能提前预测吗？可以想见，今天我们所忙的各种研究大平台，20 年后都会报废。即使在美国，曾经为 20 年后发展所作的预测基本上也都是失败的。所以今天自以为是为今后 20 年培养专业人才所做的工作，做得越精彩，可能越是落空。

我还注意到，很多学校都声称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台湾的一所大学，就列出了他们培养学生必须具备 24 项能力。我听说这一点后就问校长：“请问校长先生，你掌握了多少能力？”空洞的口号总有很多，但它们对人才培养一点用也没有。

这一代的年轻人，未来寿命会增长，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变长。我们今天培养学生，要给他们足够的能力，让他可以服务于未来的 50 年，否则他每过五年就要“回炉”一次，纳税人吃不消，大学也吃不消。

而且，未来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可能像我们这代人这样，一辈子只干一个工作。他们不会这么幸福，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比我们幸运，也许每五六年就要改一次行，因为传统职业在不断消失，新的行业又不断地冒出来，一生改行八九次都有可能。

听说教育部很重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所谓就业率，统计的主要是 23 岁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那么请问，有没有第二个教育部关心学生 5 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或者有没有第三、第四个教育部关心这些学生 10 年以后、20 年以后的第三、第四个工作？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少大学都提倡加强专业教育，注重实用技能的传授。但这却使我们的教育方向越走越偏。教育界的人应该醒悟，我们要从“人”做起，为他们一生着想，而不是为他们毕业的头五年着想。未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将来一代人的产值、他们的生产力一定是今天的两三倍。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对世界的认知和 50 年前却没有什么不同，还是按照 50 年前定下来的路在走，这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年轻学生的第二到第九个工作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二十年以后社会上会有什么行业，我们也不知道。二十年后热门的专业知识，今天还没有发展出来。我唯一可以保证的是，现在这些专业教育的内容在 20 年后都会落伍。老师辛辛苦苦教，学生辛辛苦苦学，但今后学生们会说：“老师，你教我们的东西都是落后、没用的”，这让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情何以堪？

我们的大学是培养“千手观音”还是智慧的“人”

现在的大学都说自己朝前看，但是没有大学朝后看看，哪些是不合理的，需要改变的？学科越分越细，学院越设越多，知识被支离破碎地分割成专业，年轻人被塞到一个个专业里，也许有技巧和技能，但是没有智慧。如此培养的学生没走出校门就已经落伍。

教育总是从知识传授开始，寄希望于教会年轻人一些东西，想让他们这样、那样，想让他们爱国、关怀社会、关爱人类……这些都是高调，从前的年轻人不听，现在年轻人更是不爱听。

今天的大学试图举办大量的活动，希望通过活动来改变年轻人，但看来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些活动最终可以被视为是大学的业绩，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向教育主管部门展示成果。

关于知识，我们现在还把它分解成文科和理科。文科就是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文科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各个学科都忙着成立学院。比如，历史学有历史学院，文学就有文学院，专业划得越来越窄。很不幸的是，有的大学还出现了公共行政学院。可公共行政并不是和某一个学科有关系，它和法律、人文、工程、经济等学科都有关系。我们的公共行政学院里并没有这些丰富的学科，只有公共行政技巧。但依靠这些，我们就能培养出公共行政人才？他们走出校门，立刻就会落伍。

大学里还有法学院，学法律的学生都只会背条文，但法律和经济、社会、工程、国际关系、文化都有关系，只学法律的人走出校门绝对不会有国际竞争力，甚至可以说，没有走出校门就已注定他们要报废。医学院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法学和医学都没有设在本科阶段的原因。

再说理科，和文科也差不多糟糕，数学有学院，物理有学院，这些都是理科的基本学科，很多新兴学科都是从这些基础学科中发展出来的，所有的学科怎么可能截然分开？更不用说，现在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分文理科了。而大学在学院里设的一个又一个系又使得专业分隔越来越细。

按照教育的本源，所有的学科是不应该这样截然分开的，更不应该让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按照那些很细的应用学科来学习。应用学科就像人的四肢，它的价值是可以做事，而基础学科，包括文科和理科就像人的头脑、中枢神经和内脏。如

果头脑、神经和内脏不发展起来，只发展四肢没有用。我们没把一个人培育完整，却想把他培养成四肢发达的“千手观音”，做很多实用的事情，怎么可能？！而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学里的学院一旦成立，很难撤掉。

今天，中国的大学都是有固定学制的，但现有的学制是否合理呢？以医科为例。我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所用的学制基本上是 1903 年（光绪 29 年）根据国外的大学制订的。从史料可以看出，医科从 1912 年开始直接出现在大学堂里的。但美国 1878 年就已经规定医科生必须是大学毕业后才能读的，而不是高中毕业。那为什么当初我们教育界的先辈那么没有远见？那是因为我们那时没有大学毕业生，连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也没有。所以在民国的 10 年间，中国一下子办了几万所小学、几所大学。当时的医学直接出现在大学里，接收中学毕业生，这是应急的措施。可 100 多年来，没有一位教育部长回头看看历史，看一看这个应急的措施在现在是否还合理。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培养人既要不断往前看，也需要不断地回头看，才能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需要变革的。

对完整的“人”的要求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很多人讨论钱学森之问，但是钱学森自己成才前，就已经是一个精彩的人了。我们大学只想着培养“才”，不想着培养“人”。如果真要回答钱学森之问，那么今天大学的院系应该全部打散取消。

很多时候，大学都纠结于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往往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但看看知识的结构，在古希腊时代，雅典七律里就规定了人要具备的 7 种能力，即逻辑学、文法、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它们是文理兼通的，而且第一位是逻辑，但现在哪个大学是从逻辑开始教起的？我们都是上来先分专业。

知识是不分领域的，人类遇到的问题也都是跨领域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把知识分割得那么清楚，并且越分越清楚。看问题必须要宏观思考，解决问题要从微观上着手。但现在正好相反，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只有微观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少宏观思考能力。

我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经受文理综合训练。当年我考上耶鲁大学的物理系博士，到学校后，导师让我必须修读人文学院一年级的基础课。我一听就急了，和导师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来学高能物理的，怎么让我去学人文学院一年

级的课？”结果导师说：“你首先得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了解一些物理知识的人。如果连人文学科都没有修读过，怎么能够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钱学森之问，但是钱学森自己在成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仔细看一下他的传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真的要学习钱学森，今天的大学院系应该全部取消。

不妨问问自己，作为当代人，你的困惑是什么？说到底，仍然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些问题不能达成共识，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在台湾，我发现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梦想，而大陆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的一生就是准备考好大学，至于为什么要考这些学校，却没有想过。

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从基础做起。我们的学生一定要有文理的基本修养。文科是左腿，理科是右腿，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人类文明来龙去脉，未来的走向及自我定位，这就是文盲；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数理知识，及理性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考社会问题，这就是理盲。

来源：《文汇报》（校园·文汇教育）2013-05-24

掀起一个新高潮，迎接文化素质教育 20 周年！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王义道

岁月荏苒，距离由原国家教委在这里召开的“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已经快 20 年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立足中国本土，针对实际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具有深刻意义和重要影响，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场活动从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原理工科大学首先开展起来，迅速推广到其它各类各级高校。因为这些大学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以来所实行的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的弊端感受最深，有切肤之痛。正如当时杨叔子校长形容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所说¹：他们懂得 ABC、XYZ……，却不大了解长江、黄河、文天祥、史可法……。这样造就不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改革迫在眉睫。于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轻德等现象，从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和艺术的基本知识的应知应会教育开始，开展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活动。之后，逐渐通过对理工科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对文科学生开设自然科学技术课程，以及与课外讲座、表演欣赏、实践活动等“第二课堂”相结合，强调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出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的“三提高”。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动了全国高校对整个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学习和大讨论。特别是 199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世纪转折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后，教育是“育人”，非“制器”的主旨更为明确，创新作为时代要求，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一段时期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主题。正如原教育部周远清副部长在评价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时所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切中时弊，顺应潮流”的，到新世纪就要再加上“涉及根本”²了。这个根本就是“以人为本”、“育人”。随着“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和一百来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设与运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一些学校称为“通识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与实施一途成为许多高校的关注重点。可以说，这段时期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是生动活泼、高潮迭起。此后，这项活动进到普及、稳定和深入阶段，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加入到这项活动行列，课程教学呈现出多样化和精深化的局面，在高教学会下成立了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这些都有利于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

作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近 20 年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所以能够得到高等学校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衷心拥护，长盛不衰，关键就在于这项工作是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根本，这根本一个是“育人”，一个是“文化”。合起来是“文化育人”，就是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主旨。对于贯彻落实这个主旨，我觉得当下我们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因此，我们在迎接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 20 周年的时候预期这项工作将会再次掀起一个新高潮。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关于“育人”主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宣布了“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十八大和 18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做出了坚持“立德树人”的规定。我想作为教育工作者，这是大家都能体认的，而且是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所反复强调的，尽管在具体工作上真正贯彻落实还有很多问题和很大距离，因为在当下急功近利的社会条件下会不断萌生许多新问题，来阻扰这一根本要求的落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现在遇到了抓“文化”的大好机遇。2011 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强调了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之后，“文化”已经再次引起了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北大做了一个很有深意、非常精彩的五四讲话。他主要是对全国青年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中心还是文化问题。他在讲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脱离讲稿补充发挥了一句，“这三个自信根本就是文化自信”。他鼓励大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何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指出的一个大题目。把这个题目做好，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就足以掀起一次文化素质教育更大的新高潮，习近平同志已经为这个高潮揭开了一道序幕！

二

什么是“文化”？据说文化的定义不下几百种。周远清同志将它分为大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²，非常合理。在大观层次上，我比较欣赏的是费孝通简洁描述的四个字：“人为、为人”³。“人为”就是原来自然界没有的，是人创造

出来的东西，可以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包括器具、作品、制度、机构、意识、行为等。“为人”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不利于人，因为人创造的也有会危害人的。不过他对这个简洁定义做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注解：一是这“人”是指社会人，而不是生物人；二是这“人”是“天人合一”的人而不是“天人对立”的人。否则，就会将文化带入为一己之私和与自然为敌的西方价值观之路。这样看来，“文化”甚至还可以更简单地就定义为“人化”——也是“人文化成”。当然，这“人”应该是大写的社会人。这就是说，文化是使人脱离简单的动物性而成为能与大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人的那些高级的东西。一个人离开简单动物越远，他的文化水平越高。

社会人或大写的人与简单的动物人有哪些根本区别？这里也是众说纷纭。我比较喜欢现代教育制度缔造者，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说法，区别在于三个元素（或品质）：知识、道德和虔信⁴。知识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道德是人与社会 and 自然共处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而虔信对夸美纽斯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当然就是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和敬畏。然而，我却想，其实这三个元素的排列应该倒过来，把虔信放到第一位。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虔信并不需要去信仰上帝或别的什么宗教。虔信是指要有坚定的信仰，它是取得知识和遵守道德的前提和出发点。

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这样说：中国人缺乏信仰，中国没有信仰的传统。网上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精神的民族”。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以为信仰是一个人所有行为的出发点。要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能在世界上唯一保存了绵延 5000 年不断的古老文明。确实，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浓厚的宗教情怀，但缺乏宗教信仰不是没有信仰。一个婴儿出生，他的唯一信仰就寄托在母亲身上。随着身体的成长，见识的增多，他开始考虑如何行事，考虑人生如何过，于是就开始形成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一种信仰。长久以来，虽然中国人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观念，却有坚定的价值信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地君亲师”，天是至高无上的。“天”有天命、天道、天理、天意、天心等。这“天”就是大自然，就是生命和世界万物之源，就是主宰一切的造物主。所以要尊天、敬天、畏天，就是要求人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也要按照和谐社会的规律办事。皇帝被称为“天子”，就是要求他按照自然和社会

的规律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君轻民贵，国君如果不能按照规律来履行职责、管理社会，而是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就可以由别人来“替天行道”，取而代之。人们从历史经验中晓得，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必然要遭到惩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而形成敬畏之心。我小时候吃饭从来不敢掉饭粒，就是相信浪费粮食是“罪过”，要遭天雷轰顶的。所以这种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信仰，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信仰虽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有唯一和绝对的上帝，但却可以从教育中，从人类经验的结晶中，从文化的体验和传承中建立起来。

当然，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更迭，人们的信仰，特别是其具体价值标准是会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变动迅速，思潮变幻起伏，解放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人们一直在“破旧立新”、反复折腾，一些老的信仰被批判为“毒草”、“迷信”，“旧”的破了，新的没有立起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新”的该是什么。当下，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时候，人们期待的是物质上的“现代化”。在物质追求的驱使下，有的人丧失了信仰，迷失了价值取向，以致社会上出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权势逞强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学生，不仅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个别人甚至漠视人生意义，因受到屈辱、怨恨、困苦，病痛等生活小事轻易侵害他人或了断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下中国确实十分需要重新建立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价值信仰。而在新时期再次开展一个以弘扬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为主题的文化素质教育新高潮是很有针对性、完全必要、切中当下时弊的。

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教育也符合的世界时代的新潮流。前些年美国出了一本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克龙曼写的书：《教育的终结》，副标题是“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作者认为，人生意义、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看似虚妄，却是非常现实而基础的问题，是需要每个人来回答的。但是对这样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现在大学却把它踢出去了。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⁵。他分析了美国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人文学科的衰微，科学主义的盛行，过度追求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等。可见在高等教育中忽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倾向具有国际普遍性。这是市场经济统治、物质利益至上的产物。美国是个基督教盛行的国家，

可是宗教并没有带来对这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人生基本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要靠“文化”来解决。因此在文化素质教育中提出这个问题，并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也是顺应世界潮流，而且涉及根本的。

三

怎样来掀起一个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为主题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高潮？

党的 18 大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上提出了价值要求。他们是紧密与人生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总书记号召青年过“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他的这篇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讲话，基本上都是讲文化。这种精神文化是不能像数学定理那样全靠逻辑来做科学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文化的启示、熏染、感悟、体验来接受的，并且最终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因此，以这样一个主题来开展新一波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要搞一场对 24 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逐词逐句的宣讲运动。尽管有的学校能开出一些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内涵深刻、生动活泼的课程也是欢迎的。我们主要是要抓住其精神、主题鲜明地开展一系列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设课程和讨论班，课外阅读与讲座，文艺欣赏、表演与评论，社会实践活动等。

核心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信仰，也是“立德树人”的“德”，是“文化”的基本内涵。对大学生来说，从“树人”或“育人”的角度，这 24 个字的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就在于做人的基本态度。因此，还可以进一步将它们浓缩为“正义”和“真善美”五个字。我把正义看成是人处理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的要求。人靠自然滋养生长，就要珍惜自然，而不能与自然为敌，无限攫取，“征服自然”；父母、社会、国家养育了我，我就要孝顺父母，服务社会，忠于国家。这其实就是要学会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不能恩将仇报。而“真善美”则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终极追求。

我们在教育中具体贯彻了这些精神，就算符合树立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的主题。

作为高校，课程教学是主渠道，应该首先在这方面下功夫。当然，课程的名称和内容，教学的形式和方法都是多样化的。只要符合精神，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科学，五花八门，都可以开。教师讲授固然需要，但网上课堂（MOOCs 等）、讨论班、文章评述等等形式都可采用。不过，这里特别需要关注文化经典名著名篇的选读，当然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也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文化要靠传承，传承就得有载体，经典著作就是最好的文化载体，他们体现了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和精神世界中深度思考的结晶，并且经受了多少代人的考验和筛选。因此，他们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它们是前代人的体验，所描述的境况与所表达的语言对当今世界已经相当隔膜，而且经典作家的思考深度是难以用浅表的思维来解读和领会的。所以对于普通学生来说阅读经典一般比较困难，因而教师的辅导往往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教师不仅精通经典著作，而且有比较深厚的生活阅历；不仅能给青年学子释疑解惑，而且能现身说法向学生传道，揭示人生的意义。现在能对经典阅读做到精准指导的教师十分稀缺，网上课程可以是一种弥补，但是我总怀疑人与人之间的没有直接交流就可以达到心灵相通的。一种补救的办法是“跑教”。著名数学家，我国首位第三世界数学奖获得者廖山涛院士生前说过的，他在长沙读中学，有点名气的数学教师就是“跑教”的，一个中学上完课再到另一所学校去上。东南大学的陈怡教授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工科出身的教授，却对老庄孔孟学说有深入研究，具有独特视角和解悟，对生命价值有透彻体会，出版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庄子导读著作。他不仅在东南大学任教，退休后还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跑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倡一种“自由职业”的教师模式，来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普及，颇得一些人士响应⁷。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高潮，将这种教师模式推广开来，反过来推动这一高潮，或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无好处。

不管教学采取什么方式，启发学生深入自学和深度思考是关键。高校与中小学学生学习的一个根本差别就在于要学生“自爱”，这是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张亨嘉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要学生自觉自

动来享用学校提供的教学条件来为自己成长服务⁸。哈佛大学规定其通识教育学生都要学习一篇有“美国的孔子”之称的思想家爱默生的文章，“论自助（Self-Reliance）”，并写出读书报告。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些年，清华大学对本校本科学生进行了学情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与美国同类大学相比，在很多方面清华学生表现不相上下，但在生师互动和学业挑战度上有一定差距，表现在课堂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足，学习志趣与意义感不强⁹）。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通病，我们应该把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作为一种手段来争取克服这种弊病。为此，可以运用师生互动、课堂讨论、读书评述、论文写作、辩论竞赛，等等方式，来养成学生深度阅读，深入思考的习惯。这里，除了教师的作用之外，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重要的、极好的教学活动。

此外，各种“第二课堂”活动也很重要，特别是学生亲身参与的社团活动、作品展览、表演演出、人文科技竞赛、社会实践，等等。高校要给学生提供舞台，使他们有生龙活虎，自由而充分的表演机会，激励思想火花，迸发创新思维，展示个人潜能，发挥个体优势。学校决不能做把“跳蚤”变为“爬蚤”的玻璃罩*。学校要给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机遇，使他们在教学、研读、实践等各种活动中，在与人和事以及周围环境的遭遇中得到启示、接受熏陶，从而建立起坚定的核心价值信仰，品味人生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人进行深刻思考、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做到知己知彼，应付自如，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解放”。这是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对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¹⁰，并介绍了一本书，英国高等教育家罗纳德·巴尼特写的《高等教育理念》，蓝劲松主译，北大出版社，2012）。

我深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能在这当中发挥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国的事只要中央领导重视就好办，现在我们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的直接关怀。因此，在迎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的时候，再次掀起一波新高潮是非常及时、必要，并能出色完成的。我希望我们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能策划出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法，并及时提出指导意见。

*据说动物中的跳高冠军是跳蚤，能跳过身高的100倍。有人做过试验，如果给跳蚤罩上玻璃罩，久而久之，它就只能跳到罩子的高度。如果罩高与跳蚤身高一样，跳蚤就逐渐成为“爬蚤”了。

参考文献

- [1]杨叔子.身需彩凤双飞翼——谈高校加强文化素质培养问题[C].杨叔子教育杂论选(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4;亦见:杨叔子.双翼健劲 长空竞胜[C].论文化素质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
- [2]周远清.文化的教育 教育的文化[C].周远清教育文集(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28.
- [3]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C],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20.
- [4][捷克]夸美纽斯著.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5.
- [5][美]安东尼·克龙曼著,诸惠芳译.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原著出版于2007年)23.
- [6]陈怡.《庄子内篇》精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 [7]王义遒.推进通识教育,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5):191-197.
- [8]王义遒.“无用”与“无为”——北大精神之我见[C],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9.
- [9]史静寰,文雯.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学情报告(2010)[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33(1):4-16.
- [10]王义遒.追求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J].中国高等教育.2014(9):50.

人才培养要避免短期功利主义

——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获得者，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钱颖一

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世界经济亦面临全球化竞争加剧；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世界。所有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管理类人才培养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短板？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其根源何在？大学中的商学院如何利用大学优势发展管理教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 30 周年前夕，中国教育报记者 俞水围绕以上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世界范围商界顶尖人才鲜有中国人

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初，管理教育对我国民众来说比较陌生。20 多年过去了，管理教育在中国火爆异常。近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分为几个层次，发展概况如何？

钱颖一：目前，我国的管理（学位）教育有四个层次。一是本科教育，学生年龄大约 18-22 岁；二是无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的研究生管理教育，学生年龄大约 22-24 岁；三是具备大学学士学位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人士攻读的全时或在读的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在 30 岁左右；四是有多年管理工作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攻读的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为 40 岁左右。

这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进步很大。以 MBA 和 EMBA 为例，在短短的 20 多年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有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在教育部批准设立的 39 个专业硕士学位中，MBA 是第一个举办的，为之后设立其他专业学位教育的定位、规范等起到引领作用。第二，在 39 个专业学位中，MBA 和 EMBA 的规模最大。虽然工程硕士学位整体规模更大，但其中专业领域分类繁多。第三，MBA 和 EMBA 在教育质量上的成绩也很亮眼。在权威性的英国《金融时报》EMBA 百强排行榜上，2013 年全球前十名中就有 3 个是中国大

陆的学校，加上中国香港的学校共计 4 个。这种国际认可程度在国内高等教育的各学科、各项目中都极为突出。

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我国管理教育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钱颖一：中国的管理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2013 年，中国的 GDP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三。仅从 MBA 和 EMBA 来看，现在我国每年招收 4 万多名 MBA 学生和 8000 多名 EMBA 学生。而美国一年招收 MBA 学生 15 万人。这还只是每年入学的流量差距，美国的 MBA 毕业生存量更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对管理类人才培养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受益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这种受益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趋势，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中国的管理类人才与欧美等国家的管理类人才差距何在？

钱颖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商学教育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中鲜有中国人。当然，我国的管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我们与印度相比，也显得有某种差距。比如，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管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人。但是国际顶尖商学院院长中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在全球财富 500 强中，微软的 CEO、百事可乐的 CEO、德意志银行的联执 CEO、花旗银行的上任 CEO 都是印度人。然而，在非源于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CEO 中没有中国人。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人的背景，大都是在印度国内念完本科或者硕士，再到美国等国家深造，之后进入商学院或商界。

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关系？我曾经认为，与印度相比，造成中国人缺席国际商界顶尖舞台的原因是语言障碍。不过，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培养出的人才英语水平越来越高。我也曾经思考，是不是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但现在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我猜测，这里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很大

的局限性。这些方面英文叫做“mind-set”，中文可翻译为“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这就与教育相关。

中国教育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二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很高。能够有这两点优势并不容易。这种人才优势在中国处于经济追赶期、向国外模仿学习的阶段有积极作用。但是，一旦走到技术前沿，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创新能力、领导力上就显得不足。这与学生的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密不可分。

记者：您说的这种能力，对于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对于管理类人才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钱颖一：相比工程、技术类人员，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往往更多地与社会打交道、与组织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应具备的能力要更加综合。追溯商学院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 100 年里，其名称是有一定变化的：20 世纪初成立的基本都叫商学院，“二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叫管理学院，近些年，有人提出应该叫“领导力学院”，都说明对培养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无论学生是到国企、民企、外企，还是当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其中就包括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

要警惕“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何在？

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教授的两个 EMBA 班做对比，一个是中文班（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一个是国际班（大多数是外国学生）。两个班学生提问的问题类型很不一样。中文班的学生关心的都是当前的企业问题、行业问题、刚刚发生的或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国际班的学生更多地是对你讲课的内容进行追问、挑战。前者关注的是实际问题（practical problems），后者关注的是思维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s）。这就是不同。

我在听取本科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会听到一些学生抱怨有些课对找实习单位或找工作没有用，比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哲学伦理等课程。他们希望学院多开和早开一些对找工作立即有用的课，比如会计、金融等。

记者：不过，与管理教育相关性很大的经济学，本身就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

钱颖一：是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高盛集团在北京招人时，向来面试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当利率变化的时候，某种证券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在纽约招人时，不太会问金融、会计方面的问题，往往会问与历史、哲学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与应试者探讨关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前者，他们是招聘技术人才，而后者，是招聘未来要培养的领导者。这是在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定位。

记者：教育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否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分不开？教育毕竟不处于真空环境。

钱颖一：教育既反映社会，又服务社会，还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而我们目前大环境就是短期功利主义。比如，我们追求当年 GDP、喜欢引用增长数据，但是不会讲数据背后的故事，仿佛数据本身就是目标。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你的解读方式是什么？实现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牺牲了什么，付出的长期成本又是什么？我们不去深究。

记者：对教育的评价、教育者的评价，是否也有这种短期功利主义倾向，进而影响了教育者的教育教学？

钱颖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思想性的工作，不是流水线上或程序化很强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度量其质量的工作。因此，不能用计件制、记工分等通行办法来评价、考核教师，否则容易导致数论文篇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大都是采用计件制、记工分制的教师薪酬制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华经管学院从 2009 年开始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这个改革要着眼于“大学”、“教师”、“创造性工作”这三点重要特征。正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有长远打算的空间，我们对教师的科研评价由原来的一年一评，变成三年一评，由原来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

记者：这些年，您比较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多场合都有提及，这是不是也是对抗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举措？

钱颖一：现在的一些通识教育也很急功近利。我一直认为，通识教育不是为了简单地扩大知识面和增加知识，不是为专业知识打基础，也不是作为专业的补充，而是为人的一生做准备。所以，通识教育比专业教育更注重长远。

我在 2011 年发表的《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一文中强调，通识教育是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为一体的教育体系。价值塑造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诚实、诚信、正直、宽容的人格养成；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生目标。在能力培养方面，要特别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想象力是超越现有的知识和框架；而批判性思维则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并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而核心知识的获取既有历史知识也有现代知识，既包括中国的知识也包括世界的知识，既涵盖文科知识也涵盖理科知识。这一理念也与清华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的传统相一致。

从根本上说，如果把学校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知识传授，那就偏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人才培养，一些人理解为落脚点是“才”，而我认为首先是“人”。

记者：您曾经在 2012 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开学典礼上做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演讲，您怎样理解“有用”与“无用”？

钱颖一：我们身处一个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这里的“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是短期的有用，而非长远的有用。有趣的是，当我与毕业 10 年、20 年、30 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当时看上去“无用”，但后来长期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乔布斯曾经这样反思他在大学时上的一门美术字的课，这对他后来发明电脑上的字体很有影响：“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 10 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清楚和显然。”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在 2009 年秋季学期推出了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为理念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中有一门叫“批判

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很有意义。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学院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

记者：我听说，去年夏天您为被经管学院录取的所有本科新生推荐了暑期书单，出于何种考虑？书单包括什么？

钱颖一：这份书单有 10 本书，包括：《魔鬼经济学》、《公正：该如何做好人》、《哲学的思与惑》、《科学哲学》、《回归大学之道》、《史蒂夫·乔布斯传》、《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学记》、《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位访谈录》，以及《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读书可以启发思路，扩展思想，引导思考。读书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读书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比如《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这本书，它是一个外国人写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书中描述的事情大都是我们中国学生所熟悉的，但是他的观察角度，他所描写的感受，却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角度的分析，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大学中的商学院具有独特优势

记者：人们往往把商学院分成两类：大学中的商学院，例如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独立商学院，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您认为扭转短期功利主义倾向、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大学中的商学院有哪些优势？

钱颖一：处于大学中的商学院更有利于不同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比如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可以更方便地与清华工科学生、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一起交流。我非常喜欢形容乔布斯的一句话——他“站在艺术与科学之间”。

记者：听说您经常去中学了解基础教育，比如今年 1 月份您去了北京十一学校，是否也是希望得到与此相关的一些经验或启示？

钱颖一：我会定期去中学走一走，了解我们的学生是从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向大学的。今年 1 月，我去了北京十一学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没有传统班级的概念，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走进语文教室、生物教室、地理教室，这些教室都布置不同。学生的住宿也不按照年级划分，而是混住。

目前，清华大学的本科生都是按照院系专业划分宿舍的。比如，经管学院的男生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而这一栋楼里恰好也只有经管学院的学生。学生每天接触最多的都是本学院的人。这对学生成长有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们每天沟通的对象主要都是同专业的同学，用的都是同一专业语言。如果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经常同中文专业、法律专业、电子专业、建筑专业的学生沟通，他们的沟通能力会提高。第二，不利于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多元化的个性发展。很多学生走入清华后，往往不到一个学期便没有了自信，而美国的学生进入顶尖高校鲜有这种情况。这和同专业的学生每天在一起，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在分数上进行攀比有一定关系。由于经常接触到的都是同一专业的同学，造成学生发展路径容易趋同，也不利于学生多元化的个性发展。如果不同专业的学生交叉混住，进行更多交流，可能会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缓解。

记者：如何更好利用大学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学科交叉性？

钱颖一：我举一个例子。创意、创新、创业是管理教育关注的未来焦点。去年4月，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 x-lab”，中文称为“x-空间”，它的定位是清华大学的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这是一个由清华经管学院发起、牵头，联合了清华14个院系，一起打造的从创意，到创新，再到创业的教育平台。1年来，已经有250多个项目申请进入清华 x-lab，入驻场地团队53个，注册和正在注册公司的项目52个，融资超过3300万元。这个平台面向清华所有学生和校友。

把它命名为“x-lab”，是取“x”中的两个含义，一是探索未知（x代表未知数）；二是“交叉”，即学科交叉。在创意创新创业教育这项探索上，我们跟国际上的领先商学院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是一个我们展望未来管理教育时的新焦点，我们既有潜力，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创新管理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领先。

记者：有人质疑现在的一些创业教育也很急功近利，在真正培养人的创新思维、能力上短板明显，如何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减少这种现象？

钱颖一：对于创业人才的缺乏，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创业的基础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创意，根本还是要从创意做起，不能太急功近利。现在的一些创业教育，也反映出短期功利主义，很多创业者就是“随大溜”，人家都搞IT、互联网，他也搞，提出的想法趋同，没有新颖的内容。所以我特别强调在创新、创

业之前加上创意。这又涉及前面提到的思维方式的培养、学科的融合、通识教育的探索等。

记者：我联想到当前一些人对本科阶段开设管理教育专业的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万金油专业，学生在知识积淀、专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据我了解，您本科在清华大学读数学专业，到美国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之后才到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从而进入经济学领域并成为知名经济学家。您怎样看待本科阶段管理人才的培养？

钱颖一：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美国，除了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外的 7 所常青藤大学，在本科阶段都不开设管理（商科）专业。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也都没有本科管理专业，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在本科开设管理专业第二学位。这些大学都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开设管理专业，主要是 MBA 教育。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绝大多数州立大学都会在本科开设管理（商科）专业。不过，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不分专业，实行通识教育。不像我们，大学一年级就分专业。

我国的情况应该具体分析。据统计，当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好的专业是经济类、管理类和工程类这三个专业类别。考虑到市场需求，开设工商管理本科专业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认为，本科管理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对学生视野和能力的培养。

记者：除了您以上的阐述，为实现我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化，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钱颖一：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创意、创业、创新的人才培养是管理教育中的一个新趋势。第二，不同学校的管理教育应有不同的侧重，差异化是未来管理教育的又一趋势。第三，我们要高度重视慕课（MOOCs）和在线课程给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带来的冲击，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而要积极应对，借助新技术进行教育创新。

来源：《中国教育报》（第 5 版新闻·新闻） 2014 年 5 月 16 日

论通识教育视域中的艺术课程改革

——以上海大学重点课程《音乐大师与经典名作》为例

初海伦 袁勤

（上海大学 音乐学院 上海，200444）

摘要：通识教育的改革已在当下许多高校中轰轰烈烈的展开，经过几年的实践，涌现了一批优质的课程。如何将通识教育落实到实处，需要我们不断实践、总结。本文通过对《音乐大师与经典名作》课程在上海大学通识教育过程中的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艺术类课程的改革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展望。

关键词：通识教育；艺术课程；课程改革

一、序言：改革与特色

2011年开始，上海大学正式启动通识教育机制，其改革的内容、规模以及覆盖面之大堪称上海大学历年来校内教育改革之最。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初见成果，形成了以几大模块为主体的通识课程体系，并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课程。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在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的。钱老教育思想的体系就是围绕“拆掉四堵墙”这样一个核心内容来展开。这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除了破除四堵墙以外，钱老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上海大学的师生都非常熟悉钱校长的这句话：“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1]这便是钱老给上海大学指明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向，其中心要旨就是要培养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知识面宽广、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足这样特点的新时代的人才。

钱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当下教育领域轰轰烈烈开展的“通识教育”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不仅叹服伟大的教育家钱伟长先生高瞻远瞩的通透眼光，更应该对



钱先生的思想精髓不断重温与体认。钱校长这种开放性、创造性和先进性的教育思想正是上海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和核心要义所在。上海大学的大类招生，正是在钱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设立的富有特色的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实践。所谓大类就是学校打破原有的传统按照 27 个学院，71 个本科专业来招生。而是以现有的方式，共分成三大类：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新生在入学后的第一年不直接进入学院制的专业教学，而是进入以通识教育为主体的教学，这一教学模式分为三大类十个模块，不论文理科学生在校期间都必须在人文大类通识课程完成约 20 个学分。

学校将特有的“三制”培养模式（即：学分制、短学期制、选课制）与全校范围的“大类招生”教学改革相结合，在全校大力推行通识教育的同时，结合本校实际，在课程设计、教学与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和改革。进一步将课堂教学、课外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力图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在原有良好、扎实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创建出极具上海大学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

这样的设置主要是为每届新入校的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的做预备，即入学后的第一年不细分专业方向，核心课程全部以通识课为主，以学分制选课的形式让学生自主自由地进入课程体系，使学生一边接受通识教育培养，一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现自己的特长和喜好究竟在哪里？了解自己未来可能适合学习什么？未来的朝那个方向发展？不是匆忙进入专业学习，而是放慢脚步进行思考，

从被动学习过渡到主动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大类招生首先打通了“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为学生呈现了宏观结构大学生活的蓝图，也为新入校的学生在心理的调适和寻找自我定位与未来人生目标方面提供了一个思考空间。主要目的，无非是使得大学生首先明白：大学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学历，一种生存技能，而是寻找自我、焕发理想和承担责任的人生课题。

二、探索与实践

上海大学艺术类通识课程包含在“文学与艺术”的板块中，音乐文化是这一课程模块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音乐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形态，无论从精神、思想，还是从道德、人格等方面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及效果，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历史的价值层面来理解，音乐艺术作为人类精神追求的创造物，不仅体现了人文世界的普遍理想与一般价值，并且触及了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些最特殊和最深刻的层面。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界人士贝内特·雷默指出：“音乐教育所陶冶的人性价值，对一个人道的社会秩序中现行的和正在出现的好的生活观念具有根本性，这是很明确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同我一样，从心底里确信，我们的贡献达到了我们人类珍视的意义、自我意识和满足的核心——这些价值被更加广泛地承认为个人和社会健康的中心。”²事实上，培养良好的品格、趣味，不仅是个人的财富，也是社会财富和精神的一部分。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内在品质，公众形象，更是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文化素养、文明程度、精神风貌和生活质量。

诚然，音乐文化的内涵与层次是多元多维的，对不同的群体及对象有着不同的作用。我们授课所面对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普通大学生，如何打消他们固有概念中经典艺术“曲高和寡”的距离感是授课的一个中的重点。在上海大学众多的艺术类公选课程中《音乐大师与经典名作》被推选为重点建设通识课程项目，经过实践与总结，课程结构不断完善，内容日益丰富，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课程建设的核心及重点围绕着人性的基本价值和共性价值来展开，以“人的创造性价值”为主轴，通过“普通的人”到“艺术家的人”的认知过程，将人物个性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以不同时代音乐大师的创作生活与经典作品为代表，通过聆听、介绍与解读，向学生揭示音乐文化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人文气

象和精神风貌，从艺术性、趣味性和审美性层面阐释经典作品与当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在关联，感受经典作品背后的人格力量，引导学生从艺术杰作中体验人生况味以及人性的无限可能，启发他们大胆的去发现和体悟音乐美的独特性以及艺术创造与人格之间的关联，使学生从生命的整体状态中领略音乐艺术的魅力以及创造性人格的风范。换言之，课程旨在通过音乐的视角来折射人生意义和价值，将人物与创造，时代与人文融会贯通在音乐作品中，以音乐特有的艺术形式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跨时空地与经典文化及艺术大师进行心灵交流，使得经典艺术成为探寻人生意义、以及实现美的价值、美的理想的载体。

经过几个学期的实践，我们发现学生从最初的“听音乐、混学分”到“听音乐、品人生”从被动聆听到主动体验，改变了以往艺术类鉴赏课给人“没有什么实质性内涵，上课时放放录音，考试时交篇论文”的印象。当然面对没有太多音乐文化经验的普通学生，如何绕过专业基础知识层面，达到一种审美愉悦，确实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要点，我们的课程建设和课程内容正是围绕着这一命题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众所周知，音乐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对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聆听又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课程建设中做了一些有效的尝试：如，尽可能的将音乐的知识点与作品紧密相连，以形象生动的比拟，简明扼要的解说，继而通过作品的推进，有所侧重、循序渐进地渗入一些与之相关的知识要点，以此引导学生去关注一些构成音乐美的基本元素，比如：乐器的组合及它们的表现功能、音色特点、音响的对比，旋律的形态以及作品的创作立意、表达方式，音乐的体裁与题材，音乐的风格与流派，音乐演绎的技巧与神韵等等，自然而然的将音乐语汇的特性融汇在作品的讲解中，避免了枯燥单一的纯理论性讲解，同时时刻关注学生的反应和课堂气氛，随时调整，灵活运用。简言之，通过实例，融入要素，循序渐进，恰到好处。从“通识”的层面适宜地切入音乐与人文，艺术与创造，人生与审美的意义及关系。

首先，在解析作品的过程中，我们适当地将作品的创作手法、结构体裁和音乐语汇特点等要素紧密结合在作品的聆听过程中，言简意赅地融入一些知识要点，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进入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欣赏水平。音乐虽然是非常感性的艺术，但也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而这种形式感就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完成的，如

不了解一些基本的形式结构，很容易在音乐进行中迷失方向。比如，古典音乐的创作体裁最典型的奏鸣曲式，它的核心用意就是要揭示音乐主题的内在性格和它的内在潜力，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表现的是如此鲜明。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一开头的那两个充满爆发力的降E大调和弦，就是一个铿锵有力的主题动机，整个乐章就是在这个简短的动机中不断地向前推动，不断地积聚能量，抵达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贝多芬充分地开掘和发挥了这个简单主题的潜能，整个过程层层递进、不断积累，令人惊讶地发现，如此简单的几个音符居然可以爆发出有那么多的能量。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在规律和基本形式，聆听就是一次完美的体验人性内在情感从累积到成熟再到爆发的过程。再如，从交响乐的整体结构而言，往往由四个乐章构成，在乐章和乐章之间，一般来讲乐思是连贯性的。比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这是一部与《英雄交响曲》相类似的英雄性、史诗性的作品。整个作品通过两个对立形象之间的不断冲突加以展开，因而带有巨大的紧张性和戏剧性。作品的结构非常简练、集中。如第一乐章引子的动机，就是贯穿整个乐章音乐发展的基本种子——它作为引子的动机又作为主部主题的基础，又作为副部的伴奏，结束部的基本节奏，又作为发展部展开的主要材料。同时，引子的动机也在后面几个乐章中得到不同变形的贯穿发展——，乐章与乐章之间由于相互直接引用彼此的主题，因此在结构上十分严谨并贯穿在一起。显然，这四个乐章是一个整体过程，所以就要求聆听者在乐章之间不要鼓掌以免打断音乐的连贯气息，因为整个作品是一个承上启下发展的统一脉络。

同时，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我们所关注的另外重点就是：注重内心感受，打开想象空间，鼓励学生主动投入音乐。强调音乐首先作用于人们的是一种情感方式，而不是具体的形象，情感体验是获得美感的前提。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教育的作用，首先就是要开发每一个人对音乐这样一种音响艺术与生俱有的反应能力，所以激发学生专注、投入，把握音乐中情感内容的实质是关键。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一部充满戏剧性力量的杰作，它不仅在技术上做了史无前例的拓展，更是在思想上，内涵上直接确立了音乐创作中“英雄性”构思。把严肃的人生课题引入音乐创作，被誉为贝多芬第一部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这个成熟不仅是艺术上的，更是作曲家心理成熟的外化。对于聆听者来说首先应该知晓“英雄”的缘由，了解这部作品的人文背景以及作曲家个人成长

的心路历程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随后在音符的流动中充分浸入，跟随旋律的跌宕起伏感受音乐语言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只有心生敬佩、全神贯注，才能被音符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所折服。又如，在《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中，音乐带领我们经历悼念、抚慰、抗争、宣泄等难于用语言表达的深刻内心感受，并最终将我们护送至升腾净化的崇高境界。显然，聆听这样的音乐，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追寻快乐，而是为了更深广、更远大的目的——为了理解人性，为了体验生命，为了感受崇高，使听觉体验成为了精神启迪。在这样的步骤中，欣赏者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思维和情感融入整个过程，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非常主动地参与音乐的进行并卷入其中。耳朵虽然是一个生理性的器官，但更重要的是具有审美属性的听觉系统，它跟大脑的思考，心身的互动，甚至可以和整个的生命体验完全绑在一起。

综上所述，作品的艺术性与作曲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不仅是作曲家个人的情感，更是特定时代在音响世界中所发出的历史回音，尤其是贝多芬的音乐，可以说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主义精神渗入在普罗大众内心深处的代言。总之，使学生知晓每部优秀作品都有着各自的渊源，将作品的“故事性”与艺术创造紧密结合，对于普通听众而言既是一种文化回顾，又能加深对经典艺术的理解，使听者了解的不仅是作品本身，更是作品背后的文化支撑及诸多历史信息。经典音乐的特质是通过音响来传递历史的声音和情感，并且这样的回响不是短暂的和局部的，而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刻都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勇气的精神力量之作。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经典音乐所呈现的人文价值——即音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体会、体察、理解人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与其他经典艺术一样，都是关乎“人”的学问，所以接受它、了解它、感受它就是在体味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从作品结构、表现方式到作曲家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交融，在这里经典艺术呈现的多维多重多元的欣赏内容，彰显出了永恒的价值。

通过诸如此类的实例分析与聆听体验，将理性的认知与感性的体验有机结合，无疑对欣赏水平的提升，文化内涵的领悟，人性价值的认知都会带来极大的收益。这样的听觉审美实践便是我们的课程目标：即，人文背景——艺术个性——作品体验——精神认同。

三、构想与展望

通识教育的要旨之一就是希望培养的对象能共享世界上普遍信息的核心及人类文化的共有资源,能拥有足够的感性水平来欣赏和理解能力来享受世界上各种艺术文化。“音乐作为人文领域的一员,发出的绝不仅仅是音符和音响,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泛音。特别是古典音乐,它一直是跟宗教、政治、文化、精神,以及所有艺术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所有的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与思潮都会在音乐中找到反映,同时音乐也积极地参与了西方社会和整个文化进程的推进”。³因此,将音乐艺术放入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来认识,就是为每个个体生命寻找与之交流、对话的可能。消除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对古典艺术的距离感,亦或是难以接近心理定势。使年轻人知晓真正的艺术大师都是具有丰富人性特征的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充满理想,音乐是他们生命中最自然的和真实的情感表达,所颂咏的主题早已超出了个人的小范围。由他们创造出来的经典之作最能直接映照出人性内容的美妙与深邃。

在上海大学通识课程的体系中,艺术类课程占了较大的比例。上海大学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钱校长一直以来对学校发展给予的厚望。美育教育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整体教育环境中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缺乏连贯性和完整性。大学艺术课程的开设正好弥补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缺失。此外,从“培养全面人才”的层面来看,毋庸置疑艺术类课程是培养“具有文化艺术修养”人才重要的教育途径。艺术究竟为何有这样的神圣力量,能够散发出“情”与“德”,“美”与“善”的能量,有着“怡情育德”的育人功能,这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和认知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和挖掘出艺术有效的教育功能,让更多的人能分享经典艺术的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从人性内涵还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出发经典艺术所蕴含的审美情操与道德情操,都是人格品质所不可缺少的素养。通过艺术感悟人生美的源动力与创造力是通识艺术课程的宗旨,简言之,美感教育是艺术教育的根本。艺术是美的创造物,它是我们认识美、感受美的方式。“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⁴正如席勒所言,审美教育是使人从现实生存过渡到美感生存的桥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命质量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于精神层面高度和广度,通过艺术了解人生和社会无疑是我们感

知世界多样性和人性丰富性的有效途径。

诚然，音乐的文化功能是多层面的，价值及意义也是多维度的，对于一门通识类艺术课程，我们的最终目的无疑是纯化和精炼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经验。因此，切入的角度，授课的方式以及如何围绕核心要素来展开课程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教学手段。《音乐大师与经典名作》课程以音乐的发展历史及艺术家个人风格形成的时代语境为背景，同时将音乐基本理论常识贯穿其中，使得学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艺术家个性特色以及音乐艺术的时间特性，语汇特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引导学生从理性的层面对经典音乐艺术有所感悟和喜爱，以此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经验，领略艺术的崇高与永恒以及创造的伟大与快乐。经过多个学期的实践，课程的效果初显，每学期的选课率达到 100%。除了课堂教学我们还专门编著了与课程配套的教材，并使之和课程的教学内容紧密联系，从我们所做的学生对课程的调查中得知，这个配套教材对课程的辅助学习及课外延伸性学习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通过教学网络平台与学生进行交流，对学生课外学习环节进行辅导，及时把握课程的信息反馈，从而形成了十分有效的课内与课外的良性互动，使得教学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衍生。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任课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视听共享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及课后多样化的延展学习和互动，该课程获得了广大学生的认可和喜爱，连续多个学期在学校所做的“通识课程满意度”调查评价中名列前茅。

以笔者拙见，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最终的指向是艺术灵魂与人文内涵的融合，是艺术与历史文化、艺术与审美价值和艺术与人生境界等文化和情感的解读，并以艺术特有的魅力开启美的智慧和美的心灵，通过解读，使学生读懂艺术，理解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文化内因；虽然它不属于艺术专业领域中的精英教育，但却是塑造精神上、思想上和人格上的精英，它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超越了任何知识层面的技术性和阶段性的教育，是通识教育中博雅精神的综合体现。所谓通识，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知，更是构建高尚人格的要素，它们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学习目的的非实用性，非功利性。它所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状态和需求，而不是实际生存的具体形态。因此通识教育不属于阶段性教育，而是积累人生文化经验的学习过程。“艺术教育是人生的很重大而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

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如何重大,如何广泛,可从人生的根本上考察而知。”⁵由此可见,艺术通识教育既是对“人”内在品质塑造和关怀的教育,也是不断丰富人性内涵,提升人生境界的有效途径,它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直接指向人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生存质量。因此,通识教育——即精神养成,它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精神生命的品质,脱离现实利益的羁绊,是贯穿生命整体精神成长的路径,尽管无法从量化中实现其利益转换,但它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血液,作用于整个人生旅程,它的光芒,来源于美的发现、美的创造和人文精神的积淀。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非功利性非实用性,还是艺术本身所呈现的精神价值都是通识教育所倡导核心内容,并且是实现这一教育任务非常美好的形式。我们的艺术教育任务就是要将艺术的永恒性、精神性(美感的精神体验)和经典型融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品格中去。虽然在普通高校里每一个人所学的专业不同,掌握的专业知识内容不同,但在某些领域应该构建一个共同的文化体系、文化背景,即让我们的受教育者来共同接受一些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文化信息。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恰恰应该突出一些最基本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东西;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变迁下,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即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经典?这也应该是通识教育的要旨。某种意义上讲,对教育者的而言,不是单一的知识性的专业传授,而应从更宽泛的文化视野中阐释艺术存在的普遍价值。因此,担任艺术通识教育的教师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有敬业精神,更重要还要具备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论及艺术哲学等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在“通识教育”的讨论、改革和实践成为国内高校中热门话题的当下,如何使“通识”成为“普世”,通过“经典”达至“教化”,是我们在实践、总结及不断思考中所面临的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¹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N],《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² 贝内特·雷默著,《音乐教育的哲学》[M],熊蕾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5月,第4页。

³ 杨燕迪,《文艺百家》[N],《文汇报》,2012年7月14日第6版。

⁴ 弗里德里希·席勒著,《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9页。

⁵ 丰子恺著,《丰子恺文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225页。

The reform of Art curriculum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 in Shanghai university key course “*Musicians and Masterpiece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reform of general education has been present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igorous development,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have produced a batch of high quality courses. How to translate general education into practice, we need to continue to practice and summary.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Musicians and Masterpieces* course in Shanghai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experience summary, to the art curriculum reform has made a further discussion and outlook.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Art class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作者简介:

初海伦(1959-),女,上海人,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与研究

袁勤(1978-),女,江西赣州人,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及音乐教育。

学术会议

第六次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聚焦“立德树人”



2014年5月12日至13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六次工作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2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一命题展开探讨，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迈向新阶段。

本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会议涵盖“专家报告”“院校经验交流”“专题报告”“分组讨论”等版块。专家学者研讨了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到文化素质教育之中，如何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确保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何在圆“中国梦”中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等问题，并审议修改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出席会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有重要意义，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能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境界，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洪一为大会致词，并介绍了近年来职业院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杨叔子院士指出，本次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尤其是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要求我们抓住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处理好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作重要讲话。他传达了教育部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文化素质教育始终”这一重要精神，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他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要在创新教育方法、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上狠下功夫，并强调要加强教指委和基地建设，构建使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更加有效的指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周远清以“素质教育：源头·基础·根本”为题作专家报告，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源头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民族素质”，基础是“文化素质”，根本目标是“培养人”等观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作专家报告，以“传承”“融合”“跃迁”为关键词谈文化素质教育，提出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停留在传播知识，要通过传承融合，升华、跃迁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张岂之围绕“大学素质教育的新起点”展开论述，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顾问王义遒呼吁“掀起一个新高潮，迎接文化素质教育 20 周年”。

清华大学程钢、石河子大学何慧星、西安交通大学黎荔、南京农业大学胡锋、九江学院甘筱青、杭州师范大学王利琳、安徽大学杜先能、哈尔滨工程大学董宇艳分别以“学习<纲要>精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生工作坚持立德树人的几点思考”“西安交通大学推动立德树人系统工程”“高效生态文明及生态

文化教育初探”“融优秀文化资源，创素质教育品牌”“以人文艺术教育为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共建基地工作总结和素质教育工作思考”“理工科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探索”为主题，介绍了各校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创新思路和实践经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漆思，批判性思维专家董毓分别以“调研大学生关注的中国梦议题，推进高校中国梦主题教育”和“推广中国需要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为题作大会专题报告。

与会人员认识到，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加深，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西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不断演化，使得教育功利性日趋严重，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遇到极大挑战，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确保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素质教育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需深刻认识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全面深入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同时加强保障体系建设。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欧阳康作大会总结。他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欧阳康总结了近年来各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文化素质教育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正在迎来新的春天，希望各高校抓住机遇，加强交流，共创文化素质教育的新局面。

学会代表应邀赴美参加美国 核心文本和课程协会（ACTC）第二十届年会

来稿：中央财经大学



应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之邀，2014 年 4 月 10 日-13 日，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央财经大学林光彬研究员和理事单位中山大学肖文明博士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美国核心文本和课程协会(ACTC)第二十届年会并在分论坛上作报告。北京理工大学孙刚成博士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Hutchins's Idea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ACTC)由 Stephen Zelnick 和 Scott Lee 在 1994 年创建。该学会每年都组织关于通识教育核心文本与课程的年会，会议主题涉及通识教育的经典文本和核心课程的方方面面，探讨如何从经典阅读与核心课程的教与学的角度解决通识教育的有效实施。

本次年会主题为博雅教育与学生眼中的核心课程（“Liberal Arts and Core Texts in Our Students' World”），由美国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主办，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协办，来自世界 125 所大学的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



围绕会议主题，协会资深理事、芝加哥大学前教务长 Norman Bradbrun 做了“*For What Are the Humanities Good*”的报告，协会会长、新泽西学院哲学教授 Richard Kamber 做了“*Under Plato’ s Pillow: Aristophanes’ Clouds and Plato’ s Symposium*”的报告。贝勒大学的古典学教授 Julia Hejduk 做了“*The Liberal Arts and Virgil’ s Aeneid: What Can the Greatest Text Teach Us*”的报告。

论坛除主报告外，与会学者还分为 61 个小组进行深入讨论。大会期间还设有 Workshop 和 Business Meeting、Book Sales Exhibition，其中 Workshop 就 2014 年 6 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主办的以“传统和创新”为主题的暑期学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CALE）作为国内首个全国性大学素质教育学术交流组织，理事单位林光彬研究员和肖文明博士赴美参加 ACTC 年会，不仅扩大了通识教育的研究视野，也增进了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CALE)与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ACTC)、国外名校的沟通合作，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

学会秘书长庞海芍应邀参加
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学会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 32 届通识教育教师研习会



应台湾中原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院校的邀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CFD）庞海芍、CFD 周玲副主任、CFD 张波办公室主任一行 3 人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25 日赴台湾地区参加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学会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 32 届通识教育教师研习会并调研有关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心。

2014 年 4 月 19 日，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学会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 32 届通识教育教师研习会在台湾中原大学全人教育村召开，来自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 25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为“变与常——通识教育的新挑战与新愿景”。通识教育如何在坚持主体性以及在理念和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灵活的运用策略，以迎向快速变动的社会，并创造新内涵和新的愿景？与会代表与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相关讨论和交流活动。会议由台湾通识教育学会、中原大学主办，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承办。



4月19日上午在开幕式上，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致欢迎词，中山大学副校长李萍致辞。台湾地区教育部政务次长黄碧端做《我理想的通识教育》专题报告。之后，举行了“通识二十，再开金石”的通识教育学会二十周年庆祝大会。

4月19日下午会议以“通识教育在新世代中的挑战”、“通识教育的新思维与策略”两个主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针对“通识教育的新愿景”进行了座谈。

通识教育在新世代中的挑战主题报告会，由台湾清华大学王俊秀教授主持，台湾大学黄俊杰院长以《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与通识教育的新方向》为题，台东大学刘金源校长以《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国立台东大学通识教育革新之目标与策略》为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长庞海苟以《通识教育课程——挑战与对策》为题分别作专题报告。

秘书长庞海苟做了题为“通识教育课程——挑战与对策”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大陆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情况，并就如何有效开展通识教育课程提出了建议。她指出，通识教育课程要想摆脱困境，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行三步走”的推进战略。第一步，从现有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入手，精心设计和实施，使其精细化、核心化、规范化，提高品位和地位；第二，



在保持现有课程结构的前提下，将一些公共必修课程通识化，使其真正发挥通识教育的作用；第三步，逐步改革大学四年的课程体系，建立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通识教育，表面上看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实际上将涉及到大学的教学制度乃至组织制度变革。

通识教育的新思维与策略专题报告会，由健行科技大学李大伟校长主持，广州中山大学李萍副校长以《通识教育：从技术性向价值性的归位》为题、华梵大学朱建民校长以《逆势而为的发展策略》为题、上海财经大学姚玲珍教务长以《商学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通识教育——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为题、中原大学李宜涯馆长以《求变守常，典范全人：以中原大学全人化通识教育为例》为题分别作专题报告。



之后，与会代表进行了综合座谈，通识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主持，中国医药大学黄荣村讲座教授、淡江大学张家宜校长、华南理工大学罗远芳副所长、西南财经大学马骁副校长、弘光科技大学方国权校长参与了座谈。

围绕本次通识教育活动，秘书长庞海苟一行 3 人 4 月 21 日访问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书院，该院钱致榕教授介绍了台湾政治大学的书院制度，重点就书院的课程的设计、要求、授课、学分以及书院的住宿学习制度进行了介绍。4 月 22 日，秘书长庞海苟等前往台湾清华大学访问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学习科学研究所、通识教育中心，台湾清华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所长杨叔卿教授介绍了学习科学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台湾清华大学学习科学的开展情况以及学习科学未来的发展。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黎正中介绍了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基本

情况、通识教育发展指标和理念、通识课程制度与课程内容以及台湾清华大学的特色。

通过本次交流访问，秘书长庞海芍等对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的开展和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与相关机构建立了进一步交流的合作平台，相信此次交流对于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大学素质教育学会成员参加 ACTC 暑期研讨会项目



2014年6月1日至14日，ACTC（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举办的“核心文本在通识教育中的传统与创新”暑期研讨项目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举行。项目遴选了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的15所学校，共30位成员参加。北京理工大学、厦门大学的4位会员入选此次暑期研讨会项目。项目由ACTC主席Scott主持。

研讨会主要分为三个模块：经典文本阅读课堂模拟、教学法讨论和经典文本课程实施计划陈述。在经典文本阅读课堂模拟环节，主办方精心挑选了12本世界名著，均为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生本科期间阅读书目。包括：柏拉图的《会饮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和《演讲录》，霍布斯《利维坦》、托尔维克《论美国的民主》，尼采《论道德的体系》，洛克《政府论》，卢梭《政治经济学》和佛洛伊德的《五大演讲录》、中国的老子、庄子等。

30 名参与者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典文本的资深教授 Kathy 主导，另一个小组由来自耶鲁大学的 Noma 教授主导。针对每一本书，主导人介绍她们在教授学生时所划出的重点，阅读文本时会遇到的难点，并提出思考题。参与的教师模拟学生，向主导人发问。



随后，参与者和主导人一起讨论在各自的课堂中，老师和学生们会遇到哪些难点和问题，而这些难点和问题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与会者提出：“学生们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这些经典文本？阅读他们又有什么用？”，“在讨论中，怎样让学生开口说话？”，“经典文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教最合适？”，“论坛选的题材都是西方经典，是不是应该加入其他文化的经典？”等问题。参与者们积极讨论，纷纷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每个单元结束，参与者需要做 15 分钟的陈述，讲一讲每单元的收获，感受和未来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实施计划。北京理工大学的代表庞海芴、余静介绍了本校的通识教育情况、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规划。厦门大学代表张亚群、徐岚介绍了开设某一门经典阅读课的阅读书目、学生情况和未来的计划等。参与者对中国的通识教育产生很大兴趣，纷纷提问。

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办公室主任 Roosevelt 先生在研讨班的结业总结中谈到：“通识教育从来都不是为了培养教授或者学者，或者其他什么类型的职业人。我们想要的是学生首先成为人，懂得怎样更好地理解社会，更好地生活。不论古人或是今人，在面临的某些问题上都是具有共性的。因此，让学生们读一读

前人在面对这些难题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对他们会很有助益。”

大学素质教育学会（CALE）已经邀请 ACTC 成员，在 2015 年 1 月举办的 CALE 年会上举办类似的工作坊，希望就通识教育理念和经典文本的教学法做进一步深入交流。

学术活动资讯

1. 2015 年 1 月 15 日-17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2014 年年会暨第四届高层论坛”将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

2. 2014 年 7 月 18 日-24 日“第 2 期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讲习营”将在兰州举办。

主 编：郭大成
执行主编：庞海苟
本期责编：单 敏 高 翔
本期美编：杜娟

地 址：北京理工大学中心教学楼 402 室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处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8556（传真）
邮 箱：cale_2011@163.com